

新时代贵州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研究

张家刚

安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省安顺市，561000；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贵州作为我国西部典型的多民族山地省份，长期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资源错配、集体经济组织薄弱等结构性难题，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贵州乡村振兴战略注入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贵州当前乡村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以农村集体经济重构、产业价值链再造、农村资源要素激活为核心的系统性对策建议，为实现区域协调、农民增收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贵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集体经济；价值分配

DOI：10.64216/3104-9672.25.02.051

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部署，全面引导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贵州作为西部经济相对欠发达省份，面临自然条件复杂、城乡发展差距显著、产业基础薄弱等多重挑战，同时也是脱贫攻坚主战场，乡村振兴任务艰巨而迫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揭示当前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根源，探索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创新和资源重构路径，推动新时代贵州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落地。

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乡村振兴的契合点

1.1 生产力发展与城乡关系再调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决定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方向，城乡关系本质上是生产力空间分布与资源配置格局的一种体现，农业社会农村地区承担着基础物资生产职能，城市则逐步聚集资本、技术和管理资源，形成城乡发展非均衡格局，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制约全面社会进步的重要瓶颈，马克思主义强调在高度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必须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实现城乡关系再平衡，为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乡村振兴本质上要求打破城乡割裂状态，通过基础设施一体化、要素配置均衡化和产业发展协同化，实现城乡关系的结构性重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

发展的根本导向。

1.2 所有制结构与集体经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生产关系性质的根本要素，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现实发展与应用，农村地区集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的基层体现，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在尊重农民自主性的前提下调动资源整合与组织化生产的积极性。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再生产与价值创造时指出，劳动过程的社会化趋势要求组织化和协同化的生产形式，农村集体经济正是这一趋势在基层的体现，通过股份合作、集体经营与要素共享机制的建立，实现农村资源的集中利用与剩余价值的公平分配，增强农村经济内生动力，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实质上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结构理论的延展与创新，是实现农民群众广泛参与、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基础。

1.3 分配正义与共同富裕

分配关系决定社会再生产的方向与公平性，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前提下社会财富的分配应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同时兼顾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实现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分配正义关系到经济效率以及社会稳定和人民福祉。城乡发展长期不平衡的现实背景下，农村居民在收入、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方面长期处于劣势，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标之一是通过制度性再分配，实现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收入差距的有效缩小，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配关系决定社会结构合理性”的理论深度契合，推进乡村收入结构优化、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构建公平共享的制度环境，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

2 贵州乡村振兴中的现实困境与结构性问题分析

2.1 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与城乡“剪刀差”

贵州处于我国西南内陆，山地和喀斯特地貌广泛分布，自然条件复杂，交通成本高、资源分布不均，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以贵阳、遵义、六盘水等中心城市为主的城市区域经济集聚效应不断增强，大量偏远少数民族乡村依然处于发展边缘，基础设施落后、产业支撑薄弱，形成明显的“城市强、乡村弱”格局，城乡之间的

“剪刀差”体现在居民收入差距上，也体现在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资源的可及性方面，随着城市现代产业快速发展，乡村农业的相对收益不断下降，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加剧乡村“空心化”，贵州乡村普遍缺乏稳定的工业反哺机制和财政转移补偿机制，农村地区在市场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无法获取上游资源和下游市场红利，城乡发展差距呈现结构性固化趋势，制约了乡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2.2 农村土地、劳动力与资金的错配

贵州农村普遍存在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首先受山地地形限制，土地碎片化严重，大量坡地难以实现规模化耕作，限制了农业机械化和产业集约化发展，部分农村地区存在土地撂荒问题，外出务工人口集中的乡村耕地长期闲置，无人管理，资源闲置现象普遍。其次，劳动力结构失衡突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守的多为老年人和妇女，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对技术与劳动强度的要求，加上农村金融体系滞后，农业项目难以获得有效融资，农民生产投入长期依赖自有资金，缺乏外部资本支持，经营风险高，政策性金融工具在偏远乡村覆盖度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加剧了农村资金获取困难。

2.3 基层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滞后

贵州农村基层集体经济存在组织松散、经营乏力、功能弱化等问题，制约乡村自主发展，许多村集体经济组织尚未完成产权制度规范化改革，管理体制不健全，资源闲置与资产流失现象并存，大多数村级组织经营项

目单一、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依赖租赁土地、厂房等收入来源，缺乏对产业链条的深入参与与主导权，部分乡村设立了合作社或股份制组织，但缺乏实际运作能力，不能形成有效的经济带动效应，基层人才短缺也是集体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管理人员业务能力不足、缺乏市场意识和项目运营经验，许多发展项目难以落地或效率低下，制度不清晰、组织不健全、能力不匹配，使得贵州农村集体经济无法发挥资源整合、利益联结与基层治理的核心功能，严重制约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贵州乡村振兴的路径构建

3.1 构建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所有制结构优化路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所有制结构是决定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组织方式和分配模式的根本变量，构建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所有制优化路径契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安排，为贵州实现资源整合、产业组织升级和农民增收提供了制度保障。

3.1.1 加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贵州山区资源长期存在集体资产产权属不清、资源利用低效等问题，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首先要从“确权、赋能、入股”三个环节出发。以黔南州贵定县盘江镇七星村“集体林权入股+统一开发”机制为例，该村林地资源近4200亩长期无人管护、效益低微，2021年以来村集体开展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对所有集体林地进行GPS测绘与确权登记，随后组建“七星绿色发展有限公司”，将确权林地由村集体统一运营开发，引入本地制材加工厂建设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开展灵芝、天麻等中药材套种种植并进行初加工，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按股权比例获得年度收益分红，2023年人均分红超过1200元，部分农户还被聘为护林员、采摘工等，实现了“资产性+劳动性”双重收益，制度建设方面该村出台了《集体经济收益管理办法》，明确资金分配比例，其中60%用于股东分红，20%用于集体公共支出，20%用于下一年度生产性投入。

3.1.2 推动“强村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

农村组织形态松散，集体经济缺乏市场化运作能力，通过建立“强村公司”与合作社、农户形成稳定的产业合作机制，将资源、组织与市场有机结合，打造以集体组织为枢纽的利益共同体，以遵义市播州区龙坪镇水车

坝村“村社联建”模式为代表，该村依托本地稻米种植设立村集体控股的“贵州水车坝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村“两委”成员兼任公司管理职务，统筹组织村内种植合作社与部分大户签订订单协议，公司统一品牌设计、包装、营销与电商销售，合作社负责生产标准化管理，农户提供土地与劳动力并享受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及年终利润分红，2022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超 300 万元，合作农户户均增收近 5000 元，村集体除获得租金与股权红利外还通过该平台建设冷链仓储、加工车间等基础设施，推动村庄整体产业功能提升。

3.1.3 培育壮大农村新型经营主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关系的调整应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乡村振兴进程中发展多样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推动生产专业化、经营规模化，贵州可以结合地理分散、劳动力外流等现实，政策扶持与制度嵌套，鼓励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与集体经济形成多元联结。以黔西南州兴义市乌沙镇“茶旅融合”模式下的家庭农场联合体为例，当地茶叶种植历史悠久，但过去多为小农经营、品控不一，市场竞争力弱，2020 年起乌沙镇政府推动成立“乌沙茶业联合社”，由镇域内 8 家家庭农场、3 家合作社联合组成，通过技术统一、农资共享、采摘协同、市场共建等方式形成“联合经营体”，村集体以茶园流转权及基础设施出资入股，参与管理并获取红利，联合社与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打造“乌沙山茶”区域品牌，与“兴义机场经济圈”内商超、餐饮形成产销对接通道，提升了市场议价能力，通过标准化生产实现产品等级分类销售，部分优质茶单价达到 120 元/斤，提高了农民收入。

3.2 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与价值再分配机制创新

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贵州农业向全链条延伸，建立覆盖农民、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等主体的再分配机制，是构建公平生产关系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3.2.1 打造特色产业链条，提升“农业附加值”

贵州气候多样、生态环境优越，具备发展茶叶、辣椒、刺梨、猕猴桃、稻米等特色农业的良好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农业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粗放经营普遍存在，限制了区域农业经济的质量提升，因此推动一产向二产、三产延伸，实现“产加销”“农文旅”融合发展是破解的有效路径。以遵义市播州区苟坝村“红茶+红色旅游+文创”融合发展项目为例，依托优质茶叶资

源和独特的红色文化背景打造了“苟坝红茶”产业品牌，在集体经济公司“苟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导下建设了现代化茶叶初加工车间，引进浙江农业大学团队进行茶品改良与深加工技术指导，将茶园改造为“可进入、可体验、可消费”的研学基地，设置采茶制茶课程、红茶文创集市和村落餐饮民宿服务区，实现了农业生产、文化体验与旅游消费的三位一体融合发展，该项目带动了全村 178 户农户增收，通过分红机制将公司利润的 30% 用于村集体再投资，20% 分配给参与茶园管理和游客接待的村民，实现了产业链条延伸与价值分配结构的同步优化。

3.2.2 落实农民深度参与产业链分工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中，劳动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更应是分配成果的直接参与者，农业产业化进程中若农民仅作为“原料供应方”参与初级环节，无法在加工、营销、品牌等增值链中占据一定位置，将继续固化其弱势地位，因此推动农民“股东化”“主体化”参与产业全流程是构建合理分配结构的重要支撑，以六盘水市钟山区“订单农业+合作社分红+岗位参与”机制为例，当地政府联合农业龙头企业“贵州绿丰生态农业集团”，在海拔适中、交通便利的黄土坡村发展优质马铃薯种植基地，通过合作社平台统一签订订单合同，企业提供种苗、农资与技术指导，农户按统一标准种植，按保底价格销售，规避市场风险，合作社将每吨销售利润的 10% 设为分红池，按照农户的土地投入、劳动贡献与信用等级分配，同时设立田间管理、仓储运输、产品分级、冷链包装等数十个临时岗位，优先录用本村村民，实行“工资+绩效”制度。

3.2.3 构建区域利益联结与再分配体系

农业产业不断扩张与升级的同时必须防止收益过度集中于资本方或外来企业，造成“产业热、农民冷”的发展悖论，为此应在制度层面建立区域内多元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强化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产业管道”中的地位，成为连接资本、企业与农民的公共平台，通过“再分配+再投资”机制将产业收益反哺公共事务和乡村建设。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村“村集体收益再投资制度”为代表，该村整合闲置土地资源与深圳一食品加工企业合作建设刺梨深加工厂，村集体以土地与厂房折价入股，项目盈利后企业按年支付分红资金，资金由村“两委”牵头管理，设立“集体发展基金”

和“公共服务基金”两大账户，前者用于农业灌溉系统升级、产业路铺设，后者用于资助贫困家庭教育、支持老年人养老互助活动，每季度由村民代表大会审议分红用途，确保村民知情权与参与权。

3.3 激活农村要素资源的配置与流动机制

当前贵州乡村振兴背景下，必须破解土地资源闲置、劳动力错配与资金短缺的多重瓶颈，通过制度重构与机制创新实现资源要素从“沉睡”向“流动”的根本性转变，形成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体系。

3.3.1 推动“资源变资本”，唤醒农村沉睡资产

贵州山区农村普遍存在土地碎片化、撂荒地多、林地难经营等问题，资源资产化能力不足。以黔南州独山县百泉镇泉台村“林权入股+统一经营”模式为例，当地村集体整合3600余亩村民分散承包的林地，通过林权确权确股，农户将经营权流转至村集体控股的“泉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统一规划林下中药材种植与林地旅游开发，农户按股权比例获得收益分红，还可参与项目务工获取报酬，实现“股权性+劳动性”双重收入来源。

3.3.2 构建劳动力返乡创业支持系统

贵州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造成“产业无人做、留守无依托”的局面，激活劳动力要素在于建立“返乡有项目、创业有政策、落地有支持”的系统保障。以贵阳市开阳县冯三镇“青年农创客孵化工程”为例，当地政府在乡村振兴示范区设立农创空间，提供免费办公场所、水电补贴、网络服务及创业导师指导，面向高校毕业生与返乡农民工开放，青年返乡人员可申请3万元至1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享受“两免一贴”政策，成功孵化出“农村直播带货团队”“生态农产品销售小程序”及“农技推广服务队”等新型创业项目，有效解决了返乡青年的“起步难、融资难、发展难”问题。

3.3.3 建立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机制

贵州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意愿不高、风控体系不完善，农业资金供给长期滞后，因此探索绿色普惠金融机制成为关键。以毕节市赫章县“信用户+农业保险+担保基金”模式为例，当地政府联合农商银行、县

农业农村局建立农村信用评价体系，根据农户诚信记录与履约能力授予“信用评级证书”，作为农业小额贷款的依据，引入农业保险作为贷款保障工具，设立县级风险补偿基金，为信用农户贷款提供部分担保，该机制已覆盖全县超3200户农户，累计发放贷款超1亿元，支持项目包括马铃薯种植、生态鸡养殖、中药材初加工等，金融资源通过制度保障深入“田间地头”，切实为农村产业发展注入了资本活力。

4 结语

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路径，贵州作为西部典型的欠发达省份，乡村振兴面临自然条件限制、资源配置低效与组织机制滞后等多重挑战，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与现实的制度创新，贵州乡村振兴要从体制机制层面突破，强化农村产权改革，重构利益联结机制，拓展产业价值链条，激活土地、劳动力、资金等核心要素的流动性与配置效率，同时要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以集体为依托、以制度为保障，构建适应区域特征和社会转型需要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参考文献

- [1] 吴万运. “三农”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兼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J/OL].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1-9 [2025-05-14].
- [2] 杨兴姚, 茅欣媛.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4, 35(21): 173-177.
- [3] 陈冬仿, 桂玉. 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解析[J]. 学习论坛, 2020, (12): 41-45. DOI: 10.16133/j.cnki.xxlt.2020.12.006.
- [4] 钟廿琪, 周申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乡村生态振兴[J]. 观察与思考, 2020, (02): 42-51.
- [5] 张晖. 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 求索, 2020, (01): 141-148. DOI: 10.16059/j.cnki.cn43-1008/c. 2020.01.038.
- [6] 李雯娟, 窦德强. 乡村振兴战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读[J]. 现代经济信息, 2019, (14): 388-389.